



天地雄心

王开林 著

東方出版中心



王开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地雄心/王开林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1.6

ISBN 7-80627-668-8

I. 天...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071 号

天地雄心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4,000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668-8/I·201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多年以前,我就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对此我曾将信将疑。后来,我陆续读了一些近代人所著的野史稗钞,才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

自鸦片战争爆发之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1840~1911),时间不足一百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唯有广东可与颉颃。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王闿运、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八指头陀、王先谦、叶德辉、齐白石……屈指数一数,至少有百余位莘莘英豪,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之身。有趣的是,这批邦国之彦的思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保守营垒与激进阵线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尝停歇过半秒钟,而无论革新的前锋或守旧的后卫个个都是顶尖高手,均有雄才大略,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变得波诡云谲,雾锁烟横。

风雨如晦的百年中,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和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

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来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

为何湘地人才愈是勃兴，国家命运便愈是多舛？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不已而又耐人寻味久之的问题。近代已是如此这般，现代则更加变本加厉。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便是挖掘可靠可信的史实，细加考量，谜底也许就隐藏在其中，至少也会有些意外的发现。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却如合符节。伟人是最好的镜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他们创造了时势，而一泻千里的时势则将大众全体裹胁进来，使之患得患失，方生方死，无人可以抽身规避，包括那些创造时势的伟人，有时也会被自己从宝瓶中释放出来的魔鬼拔刀斩于马下。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亡，亦百姓苦；兴，亦百姓苦”，大抵就是这十个字。英雄史诗，究竟要用多少吨民众的血泪为墨才可写成？谁也不清楚，统计学家也爱莫能助。

有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即胡适先生曾戏言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捅破了一层窗纸，可是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相和假相，难免避实就虚。须知，历史的真相和本相或

许会暂时遭到遮蔽,却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然有重见天光的时候。美国总统林肯先生曾说:“你可欺骗所有国民于一时;欺骗部分国民于永久;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全体国民。”总有一些人会用镐头掘开历史的坟冢,去探明真相。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面世了,即已初步显示出开掘“史墓”的意义和效果。

历史学家志在“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语),这项工作由外国的人去从事,他所用的载体又是滑不留手的文化随笔,无疑会破坏某些“行规”,不那么合乎矩矱。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将跳出定势和圈子,使新的见解不至于胎死腹中或遭到可怕的窒息。

“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然能获致非凡的快感,可是仅仅“推倒”不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在历史潮头站稳了脚跟的豪杰也不是轻易可被推倒的。我认为,关键之关键还是后人取更近的距离关怀前人,不纠缠于非此即彼的功罪,不轻启非善即恶的道德法庭,而力求看清他们情感的悲与喜,经历的苦与乐,命运的幸与不幸,而这些个人的悲、喜、苦、乐、幸与不幸终将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或深或浅的斧刻之痕。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与巨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真正腾飞?从何处方可获得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百多年前,不少人就被这个想法魔魔住了,曾国藩、谭嗣同、孙文、宋教仁等人无不思之良苦。自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本书共收入二十九个人物,有二十位是湖南人,有九位(李鸿章、康有为等)不是;有二十七位是近、现代人物,有两位(屈原、项羽)不是。我要声明一点,地域的概念在书中其实是相当模糊的,那些高蹈远翥的天之骄子,不管与湖南这方水土怎样血

脉相连,他们都不会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是属于世界大舞台的。“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关键是思想的脉络——从人文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而且是带着相当明显的个人趣味去细细打量,并不时时板着一副老学究的冷面孔。

历史对现实的回应有时会超乎寻常地“热情”,就像是榨汁机对水果那样不依不饶。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我已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作 者

2000年仲秋于长沙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了众多叱咤风云、头角峥嵘的杰出人物。其中,谁是英雄,谁是枭雄,谁又是奸雄,历史虽然早已盖棺论定,是非亦自在人心,然而,历史以经验教育人,就他们各自的命运遭际、人生行状而言,后人仍会从不同角度、层面对他们作进一步评说。人言言殊,各有所见。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宗旨。

本书由三组二十九篇文章组成。其一为《谁是英雄》、《强国梦》、《破天荒相公》等九篇,主要评说了项羽、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古人的历史功过与局限;其二为《天地雄心》、《桃源何处寻渔父》、《侠骨与冤魂》等十篇,重点解剖了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等反清志士的人格魅力及悲壮情怀;其三为《吹箫说剑》、《佯狂未必不丈夫》、《飘飘何所似》等十篇,集中阐发了龚自珍、王闿运、章太炎、苏曼殊、沈从文等学界文苑翘楚的道义追求。

全书文采斐然,观点新颖,情感热烈,那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历史人物似乎都跃然于字里行间,当年金戈铁马、剑气箫声宛若眼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书中那独特的感受与思考,则更是令人产生共鸣,催人奋发。

目 录

自序 / 1

义无再辱 / 1

谁是英雄 / 10

强国梦 / 18

不信书 信运气 / 25

独脚戏 / 46

破天荒相公 / 63

杀人手段救人心 / 78

江海之心 / 91

剃刀明霜雪 / 102

器识与命运 / 113

天地雄心 / 125

英雄无命 / 148

特立而独行 / 167

桃源何处寻渔父 / 180

负谤千秋 / 192

目 录

凤凰涅槃 / 209
侠骨与冤魂 / 228
老虎总长 / 239
回首叫,云飞风起 / 255

吹箫说剑 / 265
空留高咏满江山 / 272
佯狂未必不丈夫 / 290
恶之花 / 298
三副热泪 / 315
洞庭波送一僧来 / 329
飘飘何所似 / 342
活在歌声里 / 348
衰年变法 / 354
云水生涯 / 363

义 无 再 辱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
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
俗之尘埃乎？”

——屈原

如今，多数人单凭直观印象，会认为，文人是多愁善感的，是多疑善变的，也是胆小怕死的。“文革”之后，文人的形象就一直被钉在这个调调上，有时，甚至比这个调式还要低，低到了“八媚九儒十丐”的地步，所以知识分子一度被贬称为“臭老九”。然而，中国文人的脊梁弯曲成虾公模样，却并非古已有之（别将什么事情都往古人身上赖），而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才普遍多见的“人文景观”。在那之前，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等一大批脊梁硬挺的文人，处处向封建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开火，事事与反动政府唱反调，不怕打压，不怕坐牢，不怕死亡的恫吓；在清朝的雍正、乾隆时期，文网之酷远远胜过电网，仍有不少文人硬着头皮，私修“明史”，刊刻怀念故国、感伤身世的诗文，尽管深知那样做的后果会是脑袋搬家，甚至诛灭九族；在明朝，东林党人和复

社诸君子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与阉党（以魏忠贤、阮大铖为首）作悬崖上的殊死搏斗，头颈之硬，脊梁之挺，直把杀身视为等闲事，哪有半点精神的阳痿？在宋代，有苏东坡等一大批文人虽贬落至死，也不改初衷，那时的文人，更重要的身分是文官，是“一官二吏”的高阶层，倘若他们的言行只受利益原则的驱动，就很容易抹杀良知，丧失骨气。但他们坚持不同政见，在“聪明人”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撑的，跟自己闹别扭，找难受，犯得着吗？在大唐，有韩愈那样批龙鳞、捋虎尾的文人，爱佛骨胜过爱真理的宪宗皇帝他也敢惹，你说，他的脊梁是不是铁打的？是不是淬火加钢过？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曹魏末期，嵇康竟敢特立独行，“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于往狼里给司马昭那张马脸猛挥一记钩拳，你说，他是不是天地间屹然不倒的英物？在大汉，司马迁仗义直言，为身陷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犯了盛怒不可犯的暴君汉武帝，为此，他献出了中国文人最具雄风的两颗睾丸，良种没了，后世的文人便一茬不如一茬。太史公个人肉体惨遭去势，够可悲够可痛的；两千年后，中国文人整体的精神惨遭去势，则更可悲，更可痛。这出自“圣裁”的前后两刀，你倒是说说看，哪一门的独家刀法更邪恶更残忍？

喜欢披览历史的人，不难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历朝历代，强项都斗不过快刀，骨头都挡不住斧头，批判的武器都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从来如此，未曾有过什么例外，这就足以见出封建专制的“绞肉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具有何等强大的杀伤力。但任何时代都不缺少硬气的“傻子”，因为这样的“傻子”才代表着一个民族良知的觉醒，这样的“硬气”才是民族的元气。在相对蒙昧的群落中，IQ值最高的人，不被当成疯子，也会被当成傻瓜，作为不合群的异类，他们的命运如出一辙，不死于有形的刀斧，也会死于无形的刀斧。

不怕死的文人，他们的内心必然另有所惧，惧的是比死亡更可怕得多的东西。那会是什么？问得好，我跟你一样，对此抱有十足的好奇心。

屈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是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我不是史学家，不曾在时间的大坐标上作过纵向与横向的仔细考证，因而不敢轻下断言，也丝毫不觉得，让他去争取这个“中国第一”与“世界第一”的名号有任何光彩生门户之处。我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种死法——纵身跃入清流的那种死法。然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声音：

“屈原哪是溺死的？他是蠢死的！”

他摇唇鼓舌，以百般侮灭的口气发表新见，我当即怔了一下，并没有色于室而怒于市，而是强捺着火爆的性子听他往下说。

“你想想看吧，屈原要实现政治理想，楚怀王不肯给他一亩三分试验田，他尽可以去别处试试运气。连贾谊都在《吊屈原赋》中作了善意的质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战国时期，遍地纷争，人才市场全面开放，诸侯求贤若渴，比眼下的招商还要热闹得多。他跑到别国去做个客卿，十拿九稳，做宰相，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他根本不必担心会背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黑锅，于广义的‘操守’也毫无妨害，要不然，怎么会有‘楚材晋用’的成语呢？屈原是纯度为百分之百的诗人，又明知‘哲王不寤’，他若是厌倦了‘政治’这婊子样的脏东西，就该趁早收起一口哭腔，别再埋三怨四，干脆退隐江湖，做个自由自在的化外之民。行吟泽畔也好，泛舟江渚也好，‘制芰荷以为裳’也好，‘餐秋菊之落英’也好。总之，不吃楚怀王家的饭，不想楚怀王家的事，岂不落个周身轻爽？他却偏要作‘怨妇’，对楚怀王那样愚不可及的‘负情汉’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直弄得自己人不像

人，鬼不像鬼。屈原莫非真有同性恋倾向？他是为争一日之宠，才特别厌憎（其实是嫉妒）楚怀王身边的宠姬郑袖和宠臣靳尚那帮衰人？真要是那样，屈原老夫子多掉价啊！”

听了他这番话，我又有了兴趣，往更深处打量几眼屈原。他高洁的人格不仅远远超出那个时代，而且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时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说的“举世”显然不只限于楚国，他说的“众人”显然也不只限于楚人。“举世”即全天下，“众人”即天下人。明代大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正始》一则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屈原所处的战国，“仁义”简直成了笑柄，唯有合理巧用狡诈、悍勇和残虐这些黑道功夫，才能与张仪、苏秦之流一样出将入相。面对天下已亡，大浸稽首的世道人心，洁身净志的士子一旦走到极端，便会以身殉道。屈原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在道德上也不合时宜。应该进一步说，任何一位不满于黑暗现实，不愿与强权者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都不合时宜，他们若敢于将内心的愤懑呐喊出来，将它化为精神的火喷与海啸，则尤其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被杀，便是自杀。屈原自沉了，他肯将自己托付给清流，是因为他相信“上善若水”，他从渔夫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悟到了生命的原旨和要义，至上的人生境界便是以清水去浣濯自己的精神之“缨”。屈原不是蠢死的，蠢死的倒真是大有人在，他的死恰恰是智慧和良知的终极体现。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的觉悟，“聪明人”十辈子也无法修得。举世滔滔，自污者仍像猪猡在烂泥中打滚而自得其乐，他们还不明白生的旨趣，又如何明白死的意义呢？

屈原之后，同其感伤的贾谊也“自杀”了，他不是自沉于某江某河，也不是自沉于醇酒美色，而是自沉于内心的苦水。尽管他深知沉忧伤身，也曾在《鹏鸟赋》中以道家思想多方排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但他还是不能将社稷苍生抛之脑后。在不少人看来，贾谊是幸运的，才二十郎当年纪，就做了五经博士，稍后不久，即升为太中大夫，成了汉文帝刘恒跟前的大红人。虽说刘恒宣室求贤，不问苍生问鬼神，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位通情达理的“明君”。只要贾谊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老臣周勃、灌婴等人身上多作一点感情投资，就迟早可获大用。然而真性情、直肠子、书生意气的贾谊却偏要揭破天下升平的假象，不合时宜地大发悲音：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他在《治安策》里说这些话，就算好脾气好心肠的汉文帝（他曾下令废除肉刑）听了不觉逆耳，那些尸位素餐、“非愚即谀”的老臣也会恨得牙齿痒痒的。作为朝廷中唯一具有危机意识的明白人，贾谊的命运遂不容乐观，注定了要在“盛世”里成为逐臣。“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就这么回事，像屈原那样心雄万夫的爱国者只留下一些伟大的诗篇，像贾谊这样洞若观火的政治天才，只留下几篇不朽的雄文，被贬落为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教导那些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岂非不

可估量的资源浪费？积毁销骨，沉忧伤心，贾谊死于三十二岁的壮年，电光一闪的大汉天空又再度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

有高于一世之才，却无高于一世之命，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哀，贾谊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唯有甘死如饴，通过“死亡”那面镜子，欣赏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所许诺的永恒，才能得到来自天堂的慰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明白相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杀，作为谁也无法剥夺的遗产，那股磅礴的浩然之气都会成为后世精神的“氧泵”和“氧仓”。

文天祥的被杀实际上也是自杀，他完全可以不死，他甚至还可以“活”得比以往更“风光”更“体面”。但他只求速死，不肯自玷自污，甚至发出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浩叹，那宏音巨响，让无知的草木听了也会为之一惊。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将文天祥的物质生命推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虚无，但死神并非万能，文天祥的精神生命超越了死神的管辖地带，它为苍凉阴暗的人世间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赵昺跳入了惊涛骇浪的大海，换了文天祥，他也会这样做，做得同样干净利落。你别说，他们陪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把戏去死，陪着一身鸡皮的没落王朝去死，不值得；要知道，文天祥和陆秀夫这两位同科进士，不仅是作为爱国者而死的，也是作为孤洁的知识分子而死的，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见志。

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他遗书的开头四句无疑是其自沉原因最准确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所说的

“世变”，即是世道人心的大败坏大诬臭。“义无再辱”这四个字不简单，它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几千年来，力求精神孤洁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自杀这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几乎都是因为“义无再辱”。知义者必勇，知耻者必勇，勇于赴死，绰绰有余。“文革”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无力抵抗红色风暴，许多人选择了自杀，这便是知耻的最高表现，倘若没有这样一批知识精英捐弃生命，试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将有多大？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一则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那么“文革”算不算国耻？对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数。幸亏还有张志新、张中晓、林昭那样的“殉道者”，幸亏还有傅雷夫妇那样的“殉难者”，他们拚尽所有的力气，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整体水平低下的人格抬升了足足一厘米！

近代以来，陈天华 1905 年自沉于日本海，王国维 1927 年自沉于颐和园，朱湘 1933 年自沉于黄浦江，老舍 1966 年自沉于积水潭，戈麦 1991 年自沉于万泉河，我列举的显然不是自沉者的全部，那将是一张长到令人惊悚的名单，仅仅只是这几位，就足够风云变色的了。

作为革命家，陈天华看到自己的国家已堕落至毫无尊严，他义无再辱；作为学者，王国维看到乱世里学术衰颓，学者命如草芥，他义无再辱；作为诗人，朱湘看到人生的悲辛和人心的冷酷，他义无再辱；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老舍又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斯文扫地，在文庙他被红卫兵揪斗，他亲眼目睹了自己这位堂堂的“人民艺术家”转眼间沦为了牛鬼蛇神，竟连满腔热忱——他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讲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胡絮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也化成了一堆狗屎。红卫兵狠劲地咒骂他为“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文人”，这才是最毒的一招，把一位贴